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文学意义 研究

汪正龙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意义研究/汪正龙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6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蒋树声主编)

ISBN 7-305-03924-1

I. 文... II. 汪... III. 文学-意义-研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8729 号

书 名 文学意义研究

著 者 汪正龙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3596923 025-3592317 传真 025-3303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221 千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ISBN 7-305-03924-1/I·301

定 价 1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总 序

洪银兴

21 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从根本上说,21 世纪的竞争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使命,博士是高层次人才的代表。如何培养大批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使他们在下世纪成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无论是对高校本身还是对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为了展示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的学术风采,加强学科与学术队伍的建设,促进新生学术力量的成长,经过长期酝酿与充分准备,我校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此次编进《博士文丛》中的论著,大多是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我校任教的青年教师的博士论文,是在广泛动员、严格把关的基础上,根据质量第一、公平公开、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

规范运作的原则认真遴选出来的,同时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特别注重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对南大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这套《博士文丛》虽然也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基本上反映了南大青年学者丰富而活跃的学术思想,代表了南大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此次我校组织编辑出版《博士文丛》,就是从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并着眼于下世纪发展的需要,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领域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相信《博士文丛》的出版对于扩大我校的学术影响、培养青年学术骨干、推动学科建设,一定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南京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各个方面都致力于追求卓越,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这一人才摇篮里茁壮成长,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这块科学沃土上勤奋耕耘。近百年的办学实践塑造了南大师生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博采众长、汇融百家的开放精神和兢兢业业、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培育了南京大学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学风。近百年的历史,尽管世事沧桑,但这样的精神和学风一直在南京大学传承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历久弥新。正是这种优良的传统和学风,使南京大学深深植根于传统与现代的沃土中,不断从本民族和世界文化的宝库中吸取新的营养,形成了南大特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学术氛围,使南大在近百年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永不衰竭的青春活力,使学校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南京大学已成为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强大、科研实力雄厚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

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的学术大师,一流的学术大师又离不开一流的学术环境。在迈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南京大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

学将一如既往,继续改善条件,为广大教师创造更好的学术环境。同时我也衷心希望全校教师尤其是广大中青年教师,发扬我校优良传统与学风,在南大优良的学术环境里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的学术水平,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1999年5月20日

序

赵宪章

汪正龙同志 1997 年考入南京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对学术的执著。他不象某些学生那样,仅仅将读研作为改变生存环境或者增加利益砝码的跳板,而是作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途径,即将学术本身视作人生追求的终点甚至生命形式。在崇尚物欲的社会,这种精神尤其难能可贵,我很赞赏。我想,可能就是这种精神力量,支持正龙克服重重困难和困扰完成学业,交出了一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汪正龙博士的学位论文《文学意义研究》选择了一个难度很大的论题,国内目前还没有出现关于这一论题的专门著作。另一方面,文学的意义问题又是 20 世纪西方文艺学的热门话题之一,我们中国学者显然不能保持沉默,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特别是面对现代社会出现的意义危机和表征危机,我们有责任以中国学者的眼光加以审视和阐发。这就需要学术勇气,还需要相当厚实的学术积累。应该说,《文学意义研究》达到了预想的目标。

我在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所起草的“专业介绍”中是这样为文艺学定义的:“文艺学是关于文学艺术(主要是文学)的总体研究,即关于文学艺术(主要是文学)普遍规

律的研究,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是它的核心和主体。”当然,研究文学基本理论不可能不涉及文论史、批评史,但文论史和批评史也可以被纳入相应的文学史。可见,文论史和批评史即使作为文艺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处于文艺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边缘”。我这样理解文论史和批评史并无任何贬义,相反,没有对于文论史和批评史的系统考究,所谓文学基本理论也是很难站住脚的。道理很简单:你不尊重传统,传统也不会尊重你;你不由传统中来,传统也不会接纳你。但是,按照文艺学这门学科本身的性质,毫无疑问,文学基本理论研究当是它的核心和主体。正龙这篇学位论文就属于文学基本理论研究,可以说是文艺学专业最“正规”的论文选题,这也可能是我比较偏爱它的原因之一。因为近年来出现的关于文艺学的学位论文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文艺学这个学科似乎成了一个包容性最大、甚至无所不包的学科。而要做一篇象样的文学基本理论方面的论文,难度是相当大的,既需要浩如烟海的文献支持,又需要高屋建瓴的主体意识和思辨能力。正龙的论文能够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已属不易。

在有些人看来,提出某一“理论”似乎轻而易举,只要“出新”、“别样”、“引人注目”就行,其实不然。所谓“新”,即理论创新,当然是文学基本理论研究之必须,“陈词滥调”或者“新瓶旧酒”不仅是文艺学之大忌,所有学术研究概莫能外。但是,理论之“新”作为学术过程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你提出“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刻世界就要毁灭”之类的“理论”够新、够别样、够引人注意了,但是,依据是什么?依据充分吗?经得起验证吗?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作为学术过程,一方面需要充分的“依据”,一方面还需要强大的逻辑力量对这些“依据”进行有效地建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很欣赏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在黑格尔那里,“精神”、“自然”和“社会”,“象征”、“古典”和“浪漫”,既是对世界和艺术的逻辑分类,又是对世界和艺术的历史描述,逻辑规定和历史发展实

现了完美统一。马克思正是由此受到启发,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形态和历史发展进行了研究,创建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龙关于文学意义的研究显然也借鉴了这一方法,例如,关于文学意义的存在方式,正龙就把文学意义的生成首先在逻辑上规定为作者赋意、文本传意和读者(批评家)释义的“复合共生体”,同时又将上述三要素分别对应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而使整个论证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历史感,在逻辑与历史的交结点上建构了自己的理论。显然,这样的“理论创新”有根有据,不是那种“为新而新”、倚仗“大胆”出“新”的臆说。

如前所述,文艺学专业的学位论文之所以“五花八门”,是和这一学科的当下状况密切相关的。相对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其他学科而言,文艺学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换个角度讲,它还不够成熟。例如,关于研究对象问题,文艺学似乎已经伸展到哲学、美学、文化学、神话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比较文学等诸多领域。这种“伸展”如果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或学科交叉可另当别论,如果是研究对象的无限扩展或任意游弋那可就成为问题了: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学科决不是一门严整的科学学科;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艺术,主要是作为艺术的文学,如果某种研究和这一特定对象八杆子打不着边,还能称之为文艺学吗?总之,文艺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的不确定性,说明它尚未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这种情况在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其他学科,例如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学科中是不存在的。当然,文艺学的不成熟还表现在学理和学术规范诸多方面,这是其更深层次的症结。例如,随意臆造理论术语以争得所谓“命名权”,不重视实证材料的主观臆断,胡乱使用尚未成为公识的概念,将有待于论证或证明的东西作为证据信手拈来,过分关注现实事物以至于忽略了学理,等等,严肃的学术研究似乎成了儿戏。如果说浮躁学风是当

前学界的流行病,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文艺学是重灾区。这一“重灾区”之“重”就重在,它本身存在的许多问题至今尚未被人们所认识,特别是尚未引起圈内人士的足够的警觉,当事者迷。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我国培养的一大批文艺学博士,经过严格的科班训练,已经摸到了文艺学的治学之门。入门亦正,立志亦高,他们才是我国文艺学走向成熟的希望所在。

权为序。

2002年1月24日
于南京草场门寓所

目 次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	洪银兴
序	赵宪章

绪 论 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意义问题与文学意义的研究

.....	1
小引 人文科学的解释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意义和 文学意义研究的兴盛	2
一、意义与哲学	7
二、意义与语言	13
三、意义与历史	17
四、意义与解释和解释学	21
五、意义与文学和文学理论	25

第一章 文学意义的存在方式	30
一、“表征危机”与意义危机	31
二、从自在到建构：20 世纪文学意义观的转变	39
三、文学意义的存在方式	48
1. 意图或“原意”：一个关系性存在	49
2. 语言与被表现的客体化内容：通向蕴意的指意	54
3. 恢复与重构：解读中的意义呈现	61

第二章 赋意	71
一、意图的模式	71
二、作者的声音：思想与评论	75
三、表意策略	80
1. 题—文关系	80
2. 直书与曲笔	82
3. 用典	86
四、私人意义的可能性	88
第三章 传意	93
一、传意之途：作品—文本—大文本	94
二、语音与意义	97
三、意象、隐喻、象征	104
四、“单义”、复义与朦胧	110
五、沉默、空白与言外之意	116
第四章 阅读与释义	122
一、读者地位的上升与多极意义解读的兴起	122
二、从压迫到选择：文学言语交流语境的变迁	127
三、反应与抽象	132
四、“正读”、误读与曲解	138
五、女性与文学阅读	145
六、意图与文学释义	152
七、释义模式举隅	157
1. 社会学模式	157
2. 心理学模式	160
3. 结构主义模式	162

第五章 中西文学意义观之比较·····	166
一、汉字与拼音文字：构意的不同路径·····	166
二、言、意、象与意、象、言：逆向演进的轨迹·····	171
三、索隐与实证：经验分析的不同方式·····	176
四、超越语言：中西文学意义观融合的可能性·····	181
第六章 各体文学中的意义问题·····	184
一、小说·····	184
二、诗歌·····	189
三、戏剧·····	195
结 语 走向对话的意义·····	201
附录一 价值：文学的功能性意义·····	212
附录二 理解与选择：文学翻译中的意义问题·····	230
参考文献·····	242
后 记·····	256

绪 论

人文科学视野中的 意义问题与文学意义的研究

20 世纪以来,意义问题成为人文科学包括文学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人文科学有关意义问题的讨论对文学意义的讨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文学意义不仅与语言有关,而且与历史、解释和哲学息息相连。文学除了具有语言意义之外,更具有丰富的人文意义。各门人文科学的意义讨论不仅对文学意义研究在方法上有借鉴之效,而且在思想上有启迪之功。文学意义的人文背景和跨学科性决定了文学意义研究的重要性与特殊地位,包括文学意义研究在内的人文科学的意义研究是人文意义反思与意义重建的一个方面。所以,卡西尔说:“在我们研究语言、艺术、神话时,意义的问题比历史发展的问题更重要。”^①本书在肯定文学的语言意义的基础上,主要把文学意义定位为人文意义,并考察文学意义的存在方式。

①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8 页。

小引 人文科学的解释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 意义和文学意义研究的兴盛

人文科学的两个转向——解释学转向和语言学转向，直接推动了意义和文学意义研究的兴盛。人文科学的解释学转向萌芽于近代而形成于20世纪初，它使人们认识到人文科学的理解性和价值性。传统的人文科学（包括哲学、语言学、历史学、解释学、文学理论等等）总是致力于追求共时性的不变的东西，这一点自维柯的《新科学》开始有了改变。《新科学》试图建立一门以人文科学为主的包罗万象的社会科学，它提出了历史创造的构想并尝试了历史描述的方法，力求在历时的消逝的历史性或时间性中找到一个永恒的东西。它还断言艺术在发生上对哲学和科学的优先性及艺术诗性智慧的隐喻思维特征。此后康德赋予主体以统摄感性杂多的先验的认识机能，为人文科学主体精神的确立和解释学转向开辟了道路。现代解释学的奠基人狄尔泰沿袭维柯的思路，在强调哲学知识普遍性的同时，把哲学定位为关于现实的知识，因此它比之注重创造的文学艺术来说不是第一性的初始的东西，而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东西。狄尔泰称哲学、历史、艺术等的研究为“精神科学”，它们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只是外在于人的事物的因果性的说明，而是和人的生命有关的历史性的意识活动的产物，而理解作为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是对生命表达即意义的把握。

现代的卡西尔、库恩、伽达默尔等人进一步反思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特点，突出人文科学的理解性和价值性。概而言之，在自然科学中，经验被认为是客观的，被称为经验的类似法则的关系是外在的，故自然科学中的意义是同事实相分离的，其语言

是精确的、定形的和朴实的,因而其意义是单一的涵义。而在人文科学中质料和理论是相互融合的,质料是由指令、有意图的行为、人工制品、社会法则等组成的,理论则是对事实本身摹仿的重建,其意义是构成事实的东西,因而人文科学的语言常常具有多义性。伽达默尔更是对语文学的意义理解和历史学的意义理解作了区分:文学研究的文本是先于解释的尺度被给予的,在本文中陈述的意义的同时性是通过语文学家的解释而设立的;历史学家则建立意义关联性或纠正与打破惯常的意义结构,以便寻求后面隐藏着意义,这种意义也许根本达不到意义证据的同时性。

人文科学的语言学转向开始于20世纪初。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视语言为同现实相互并列的存在,使人们注意到语言自身的建构功能。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任意性、语言和言语的差异性等重要观念,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研究语言对世界的表征问题以及通过语言研究人的交往行为,结构主义文论、符号学文论及其意义讨论随之应运而生。

人文科学的解释学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共同推动了20世纪以哲学、语言学、历史学、解释学和文学理论为代表的各门人文科学对意义的研究。其中尤其是哲学界的分析哲学、现象学和解释学关于意义问题的探讨对人文领域的意义讨论起到了引导作用。哲学界对意义问题的关注是从对传统形而上学意义观的反思开始的。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形而上学和受之影响的传统文学理论在意义观上持有普遍性观念引导的超验化纵深取向。这种意义观强调语词与抽象实体的对应性,人的思想借助于语词可以穿透变易不定的事态直达实在的本质结构。它在文学理论上的表现就是艺术摹仿论。按照艺术摹仿论,现实的生活世界作为理念的本质世界的不完全的影子是不真实的虚幻的世界,生活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关系在传统文论中构成了现象—本质、虚幻—真实、偶然—必然、个性—共性的意义秩序与等级认定,传统文论的意义观以对

超验的理念世界的共性和规律的纵向追索为指归。柏拉图最早对这种等级关系作了论证。他在《理想国》中写道,事物的真正本质是普遍的理念,现实事物仅仅是理念不完全的投影。而艺术只能摹仿这不完全的投影,所以不能达到真实。他以画家画床为例,认为第一种床是“真正的床或床的本质的形式或理念”,“其次一种是木匠造的床”,木匠“只能制造一种像实在(并不真是实在)的东西”,“再一种是画家画的床”。画家只是前“两种人所造的东西的模仿者”,因此他画的画和真理“隔着两层”^①、对艺术揭示真理持悲观态度。主张“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黑格尔则对艺术表达普遍真理持乐观态度,他认为:“艺术的功用就在使现象的真实意蕴从这种虚幻世界的外形和幻相之中解脱出来,使现象具有更高的由心灵产生的实在。”^② 与之相反,以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摒弃传统意义观的超验性和终极诉求,以“可证实性”作为意义理论的核心和标准,把意义问题还原为与物质性东西相对应的语词分析,意义是以实在经验为基础的,是通过科学归纳和语言的正确使用而形成的。艾耶尔有限度地承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诗人所写出来的句子是有字面意义的。……说许多文学作品大部分是由假话所构成,并不等于说它们是由妄命题所构成。事实上,语言艺术家写出没有字面意义的句子是非常少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地方,那些句子是为了它们的韵律和平衡而精心选择出来的。”^③ 因此,源自分析哲学的分析美学和语义学派在分析文学意义时单一地求索语词涵义,使人们注意到文学意义的经验层面,但却使文学的人文资质和精神意味流失殆尽。

如果说分析哲学及分析美学、语义学派旨在把意义实证化、技

①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0—392页。

②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页。

③ 艾耶尔:《语言、真理和逻辑》,尹大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术化,解释学则以对解释者理解前结构的强调突显了主体的基础性地位,读者带着由前理解、前观点所形成的阅读预期去研究本文,观点的这种投射使本文验证了他所预期的东西。到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那里,由于更加注重个人理解,意义终于变成主体的生活形式。

这就容易出现三种极端偏向,或者是将超验的意义世界具体化而成为思想、艺术和生活中的纵向意义召引,或者是干脆沉湎于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语言意义的分析而对终极意义不作深究,或者是把意义当做是随个人理解前结构和阅读语境的不同而变化万端、难以确定的某种东西。

现象学意义观看重观念意义,但又顾及到意义存在的特殊性。受现象学意义观和现象学交互主体性学说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之后,文学理论界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语用学和赫施的客观解释学为代表,反省了传统文学意义观的超验化倾向和现代文学意义观的涵义化倾向或虚无化倾向,企图在人类言语交往的普遍性中研究文学意义问题,把超验意义和语言意义、文本的客体属性和读者的社会特性及阅读语境结合起来,取得了明显成效。

总的来说,20世纪文学意义研究经历了由自在意义观到建构意义观的转变,即先前人们认为文学意义是作者意图决定的存在于作品中的客观内容,现在人们则要么认为文学意义是语言或读者的建构,要么认为文学意义是由包括读者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我们认为,传统意义理论仅仅从语词、思想和实在三者的关系考察意义是不够的,意义实际上包含了物理的语言的意义和人文的文化的意义两个方面。前者指文字或符号客体化的内容,相当于汉语中的“涵义”或“意思”,或英文中的“meaning”或德文中的“Sinn”),它对应于文学作品的字面意思或文本客体化内容所呈现